

The Analysis about
Mechanism on Spillover
Effect of Service FDI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 溢出机制研究

◎ 王晶晶 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The Analysis about
Mechanism on Spillover
Effect of Service FDI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 溢出机制研究

© 王晶晶 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机制研究 / 王晶晶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 - 7 - 5141 - 7444 - 1

I. ①服… II. ①王… III. ①服务业 - 外商直接投资 - 研究 - 中国 IV. ①F7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8902 号

责任编辑: 齐伟娜 金 梅

责任校对: 徐领柱

责任印制: 李 鹏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机制研究

王晶晶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010 - 88191540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箱: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jjkxcbs. tmall. com](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 × 1000 16 开 12.75 印张 200000 字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7444 - 1 定价: 35.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8819151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88191586)

电子邮箱: [dbts@ esp. com. cn](mailto:dbts@esp.com.cn))

前言

在经济服务化的背景下，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出现了深刻的变化，FDI 逐步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服务业已超过制造业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第一大产业。自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开创以来，技术进步的源泉成为经济学家们关注的重大课题之一，而 FDI 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获得正向技术外溢，促进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竞争效应、人员流动效应、前后向关联效应以及学习效应是东道国实现 FDI 正向溢出的主要渠道。伴随着服务业 FDI 规模的扩大以及 FDI 的结构性转变，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服务业 FDI 的区位选择以及其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本研究正是建立在 FDI 结构转变这一重要现实背景下，考虑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异质性，结合服务贸易、产业经济学以及新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对服务业 FDI 的溢出效应以及其溢出机制进行试探性研究。本研究主要包括三部分：

第一，通过对服务贸易模型的拓展，进一步揭示服务业 FDI 溢出效应的机制。模型结果显示，当服务为最终产品的投入时，服务业 FDI 可通过增加东道国产品种类、扩大东道国的生产规模，促进东道国技术水平的改善和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提高，从而形成正向溢出效应。根据该模型的结论，并结合现有文献的分析，本文将服务业 FDI 的溢出机制分解为三个效应：R&D 溢出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集聚效应，并分别基于不同

的模型对三个溢出机制进行具体理论分析。首先,通过对生产分割理论模型的拓展,分析服务业 FDI 的 R&D 溢出效应;其次,通过对鲍莫尔非平衡增长模型的拓展,考察服务业 FDI 产业间溢出效应,得出服务业 FDI 可通过影响制造业生产率和服务业生产率,从而影响整体生产率的提升;最后,结合 H-O 模型与新经济地理学原理分析得出服务业 FDI 产生的集聚效应,其中,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是影响本地服务业集聚、实现集聚正向外部性的关键因素。

第二,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服务业 FDI 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研究结论表明:服务业 FDI 的溢出效应显著,并主要体现在技术效率的提升;分行业层面实证结果显示,金融服务业 FDI 的溢出效应也显著,而非金融服务业 FDI 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最后,利用汉森(Hansen, 1999)的门限回归模型,本研究对服务业 FDI 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做“门槛特征”分析,并发现东道国物质资本和研发投入对服务业 FDI 溢出效应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而产业结构与城市化水平对其影响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这些结论为东道国以及中国如何获取服务业 FDI 的正向溢出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三,分别对服务业 FDI 的溢出机制进行实证检验。首先,对服务业 FDI 的 R&D 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东道国服务业 FDI 所带来的国外 R&D 溢出效应显著,并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溢出机制存在异质性。具体来说,发达国家通过这一途径的 R&D 溢出效应显著高于整体样本,而发展中国家通过这一途径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另外,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和制度因素能够促进服务业 FDI 的 R&D 溢出,但金融发展水平却影响这一途径的溢出。其次,本研究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服务业 FDI 的产业关联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 FDI 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产业间溢出,即体现在提高制造业的生产率,这就解释了当外资流向生产率处于劣势的服务部门时,不但没有抑制东道国整体的技术进步,反而促进了生产率的提升;随后通过对服务业 FDI 的产业间溢出效应进行门槛效应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产业结构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对服务业 FDI 的产业间溢

出的影响，均存在“双门槛”效应。最后，通过行业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 FDI 能够显著促进本地服务业企业的集聚，而生产性服务业 FDI 对各自产业的促进作用高于整体水平。但消费性服务业 FDI 对消费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随着分位数的提高，服务业 FDI 的回归系数由负转为正，并逐渐提高，即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流入更有利于高集聚程度的行业，而对中、低等集聚程度的服务业集聚影响不显著。城市面板数据检验结果也表明，服务业 FDI 能够强化服务业集聚对服务业生产率促进作用。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1	
	第二节 研究对象的界定 / 4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7	
	第四节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12	
第二章	文献综述	(15)
	第一节 FDI 的溢出效应研究 / 15	
	第二节 FDI 的溢出机制研究 / 18	
	第三节 服务业 FDI 与东道国经济发展 / 26	
	第四节 对现有文献评述 / 38	
第三章	服务业 FDI 发展的特征与影响因素	(41)
	第一节 全球服务业 FDI 发展的主要特点 / 41	
	第二节 我国服务业 FDI 发展的主要特点 / 46	
	第三节 服务业 FDI 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52	
第四章	服务业 FDI 溢出机制的理论分析	(62)
	第一节 服务业 FDI 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 / 62	
	第二节 服务业 FDI 溢出机制：研发外溢效应 / 70	
	第三节 服务业 FDI 溢出机制：产业关联效应 / 76	
	第四节 服务业 FDI 溢出机制：集聚效应 / 80	

第五章	服务业 FDI 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86)
	第一节 计量模型的构建 /	86
	第二节 相关变量测算和数据来源 /	87
	第三节 服务业 FDI 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92
	第四节 服务业 FDI 溢出效应的门槛特征分析 /	100
第六章	服务业 FDI 溢出机制：研发外溢效应的实证分析	(108)
	第一节 计量模型的构建 /	108
	第二节 相关变量测算与数据来源 /	110
	第三节 服务业 FDI 研发外溢效应的实证分析 /	118
第七章	服务业 FDI 溢出机制：产业关联效应的实证分析	(127)
	第一节 计量模型构建 /	127
	第二节 相关变量测算与数据来源说明 /	129
	第三节 服务业 FDI 产业关联效应的实证分析 /	133
	第四节 服务业 FDI 产业关联效应的门槛特征分析 /	143
第八章	服务业 FDI 的溢出机制：集聚效应的实证分析	(151)
	第一节 服务业集聚程度的测算 /	151
	第二节 服务业 FDI 对服务业集聚影响的实证分析 /	155
	第三节 服务业集聚对服务业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164
第九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177)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177
	第二节 主要政策建议 /	181

导 论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20 世纪 60 年代初,发达国家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①”转型的趋势。富克斯(Fuchs, 1987)指出,服务部门(又称“第三”部门或“剩余”部门)在经济研究中长期受到轻视,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服务部门已成为美国经济中占比最高的部门。^②截至 2012 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全球经济产出的比值已超过 70%,世界经济已步入服务经济时代,然而外商直接投资却一直青睐制造业。诸多学者对 FDI 的高速增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丰富了外商直接投资理论(Markusen, 1995; Caves, 1996; Raff, 2001)。随着各国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提高,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出现了深刻的变化,外商直接投资逐步从制造业转向了服务业,根据《世界投资报告(2013)》数据可知,截至 2011 年,全球服务业 FDI 存量达 132 881 亿美元,服务业 FDI 占比已达 63.7%,比 1990 年上升了近 12 倍。事实上,《世界投资报告(2004)》就以“转向服务业”(The Shift

① 从最根本上讲,服务经济时代意味着服务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即无论是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还是服务业从业人数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以及服务消费占全部消费支出比重均超过 50%。

② 维克托·R·富克斯著:《服务经济学》,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

Towards Service) 为题, 阐述了 FDI 转向服务业的趋势, 并提出服务业国际转移的主要形式包括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业务离岸化。随后, 关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加。

值得关注的是,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也表现出相同的特征。2004 ~ 2011 年, 服务业 FDI 占总体 FDI 的比重从 23% 上升至 50%。2011 年, 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到 1 160 亿美元, 其中制造业 FDI 和服务业 FDI 分别为 557 亿美元和 583 亿美元, 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外资总量比重首次超过制造业, 成为吸引外资流入的第一大产业。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13 年我国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 614.51 亿美元, 占总体 FDI 的比重达 52.3%, 创历史新高。中共十八大明确指出, “应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目标, 推动开放型经济朝着优化结构的方向转变, 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 鼓励外资进入服务业。” FDI 流向服务业同时意味着外资结构的优化以及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提高, 因此服务业 FDI 的发展尤为重要。从产业发展情况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服务业出现了释放性增长, 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从 1978 年的 23.9% 上升至 2012 年的 44.6%, 服务业就业份额从 1978 年的 12.2% 上升至 2011 年的 35.7%。服务业迅速发展和 FDI 的结构性转变为研究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对于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后产生的溢出效应, 现有研究大多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考察制造业或者整体 FDI 的溢出效应, 对服务业 FDI 的研究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学者们用统一的模式研究 FDI 的溢出效应, 忽略了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差异性。其中, 国内学者更多的关注服务业 FDI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研究方法上看大部分采用时间序列或是行业面板数据分析, 有些研究仅对服务业 FDI 与 GDP 等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 这些方法以及数据无法真正体现服务业 FDI 的溢出效应, 更不能深入分析服务业 FDI 的溢出机制。

事实上, 服务业 FDI 溢出机制在理论上值得关注的原因有三点: 第一, 服务业 FDI 是商业存在模式服务贸易的主要载体, 因此, 服务业 FDI 的溢出效应实际上是服务贸易对技术进步影响的另一种形式, 那么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新新贸易理论等国际贸易理论可用来解释服务业 FDI 的溢出。第二, 研究服务业 FDI 必须考虑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

差异性。服务业一直被认作是一个具有本地化、非贸易特征的产业。鲍莫尔 (Baumol, 1967) 的“成本病”模型指出相对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持续上升, 服务业劳动生产率长期停滞^①, 即服务部门为“滞后部门”, 而制造业部门为“进步部门”。因此, 当一国的资源流向生产率增长滞后的服务部门时, 会导致一国整体生产率的下降。但是, 早期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假定部门生产率外生, 当生产率外生给定时, 得出的结论很难信服。随后许多学者在改变这一假设研究发现: 若满足一定条件, 资源流向服务部门并不会导致鲍莫尔所预期的生产率增长受抑制, 相反由于服务行业的特殊性, 可以带动一国的经济增长 (Sasaki, 2007; Pugno, 2006; Vincenti, 2007; Sasaki, 2012)。那么, 分析 FDI 流入处于生产率劣势的服务部门对整体生产率的影响, 也是从服务业开放的视角, 对“服务业发展悖论 (service paradox)”的另一种解释。第三,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 服务业 FDI 的流入就会形成服务业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集聚, 无论是制造业 FDI 还是服务业 FDI 的流入都会影响“中心—外围”体系, 因此从区位选择上来看, 服务业跨国公司企业产生的竞争效应、人员流动效应、学习效应以及“挤出效应”会对本土服务企业的集聚产生一定的溢出。

那么, 服务业 FDI 的溢出效应是否存在, 溢出效应的机制有哪些, 这些机制的实现路径如何?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从理论上来看, 丰富了服务业跨国投资、服务经济学以及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理论。从现实意义上来看, 不仅为解决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而且能够在经济结构转型的状况下, 为如何合理利用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 实现技术进步提供合理的政策建议。因此, 本文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和理论价值。基于此, 本文将考察服务业 FDI 溢出效应的存在性以及服务业 FDI 溢出的内在机制, 并分别对其进行实证检验。在理论研究方面, 对服务贸易理论、生产分割理论以及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进行进一步的拓展, 以期深入地分析服务业 FDI 溢出的理论机制; 实证研究方面, 笔者结合跨国面板数据、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行业面板数据以及城市面板数据在理论分析的

^① 鲍莫尔 (Baumol) 曾经以“小提琴四重奏”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300 年前, 莫扎特的小提琴四重奏需要四个人一起合作; 现在依旧如此, 很难发现类似行业生产率有提高的迹象。

基础上对服务业 FDI 溢出效应及其机制进行深入且全面的分析；在生产率的计算方面，本文采用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TFP）、技术进步（TC）与技术效率（EC）作为生产率的指标，尝试分别对跨国和中国、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生产率进行分解，从研发溢出、产业关联和产业集聚等方面研究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机制，并指出其提升生产率的有效途径。

第二节 研究对象的界定

一、服务业

20 世纪 30 年代，费雪（Fisher，1939）与克拉克（Clark，1940）提出了经济增长阶段模型，并将服务业定义为“第三产业”。第三产业是除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各业。目前各国对第三产业的界定存在显著差异。

（1）联合国贸发数据库（UNCTAD）将服务业分为 12 类，即电力、燃气和水的供应业，建筑业，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运输、仓储及通信业，金融业，商务服务业，公共管理服务业和国防，教育业，卫生和社会服务业，社区、社会和个人服务业以及其他服务业。世界贸易组织（WTO）将服务业分为 12 大类，即商业性服务（其中既包括个人消费服务，也包括企业、政府消费的服务），通信服务，建筑服务，销售服务，教育服务，环境服务，金融服务，健康及社会服务，旅游及相关服务，文化、娱乐及体育服务，交通运输服务及其他服务。鉴于 WTO 的分类主要是针对服务贸易，本书在对全球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进行分析时，采用的是 UNCTAD 的分类方法。

（2）中国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54—2002）的划分标准，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包括除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包括了一级分类中的 14 个部门，具体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

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国际组织等。在本文中, 研究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时, 采用的是此种分类方式, 本书中我国的服务业是第三产业的同义词^①。

二、服务业 FDI

FDI 包括 IFDI (Inward FDI) 和 OFDI (Outward FDI), 即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 本书所研究的服务业 FDI 是指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S)^② 的定义, 服务贸易包括以下四种不同的交易模式: 即跨境交付 (cross-border provision)、境外消费 (consumption abroad)、商业存在 (commercial presence) 以及自然人流动 (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s)。其中商业存在模式是如今最主要的服务贸易模式, 是指一缔约方在其他任何缔约方境内通过设立商业实体而为当地消费者提供服务。该种形式的服务贸易主要以服务业 FDI 为载体来实现。

三、溢出效应

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后会通过不同的机制产生溢出效应, 戈戈 (Kokko, 1992) 指出 FDI 的溢出效应主要通过四种途径实现: 一是示范效应 (demonstration effects), 又称之为传染效应 (contagion effect), 即东道国企业对外资企业的模仿和学习, 促进技术进步; 二是竞争效应, 即跨国企业的流入会带来东道国本地市场的竞争, 竞争加剧时会提高市场准入门槛, 淘汰效率低的企业, 从而提高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 三是人员培训效应 (train-

^① 1985 年起, 在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中, 第三产业一直是服务业的同义词。2002 年新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 将农、林、牧、渔业列入第一产业, 使得服务业与第三产业出现差别。但农、林、牧、渔业的规模不大 (何德旭, 2005), 本书以下所指的服务业, 均等同于第三产业的概念, 制造业等同于第二产业。

^② 1994 年 4 月, 各国经过反复磋商总结,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签订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 GATS), 并定义了服务贸易。

ing of local employees), 即东道国在跨国企业接受良好的培训, 但此类员工若流动至本土企业, 则会产生一定的溢出效应; 四是前向关联 (forward linkages) 以及后向关联 (backward linkages) 效应, 后向关联是指跨国公司带来东道国上游供应商的技术进步, 而前向关联即跨国公司与下游消费者之间的关联效应^①。

不同学者对 FDI 溢出效应进行了不同分类:

(1) 凯夫斯 (Caves) 的分类。凯夫斯 (Caves, 1974) 认为 FDI 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资源配置效率 (allocative efficiency), 竞争效应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第二, 技术效率 (technical efficiency), 跨国企业往往能够为东道国提供更高水平的技术, 东道国企业通过竞争、购买以及为跨国企业提供生产和服务提高技术效率, 技术效率的提升主要归结于跨国企业的竞争效应以及示范效应; 第三, 技术转移 (technology transfer), FDI 的流入有助于促进东道国技术创新和转移。这种渠道的溢出可以为东道国带来净收益, 因为与竞争效应渠道相比, 技术在跨国公司之间的溢出更为迅速。在资本产品的国家贸易过程中, 非专利发明的自由流动、专利许可以及技术诀窍 (knowhow) 的转移更容易发生^②。

(2) 直接溢出效应 (direct effect) 和间接溢出效应 (indirect effect)。布鲁斯多姆和戈戈 (blomsrom and kokko, 1998)^③ 将 FDI 的溢出效应分为直接溢出效应和间接溢出效应, 并指出 FDI 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的理论分析主要基于传统贸易理论以及产业组织理论。贸易理论强调 FDI 的直接溢出效应, 如对要素获得、就业以及对资本流动的影响; 产业组织理论则强调 FDI 的间接溢出效应 (或者称之为“外部性”)。

(3) 产业间溢出 (inter-industry spillover) 和产业内溢出 (intra-industry spillover)。佩雷斯 (Perez, 1998)^④ 从产业结构的层面, 将跨国公司的溢出效应分为“产业间溢出效应”和“产业内溢出效应”: 前者是指跨国

① Kokko 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ost country characteristics and spillovers* [J]. 1992.

② Caves R E., *Multinational firms,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host-country markets* [J]. *Economica*, 1974: 176-193.

③ Blomström M, Kokko A.,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spillovers* [J].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1998, 12 (3): 247-277.

④ Perez T.,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echnological spillovers* [M]. Routledge, 1998.

公司通过前后向关联带动上游供应商或下游生产商的技术进步；后者是指跨国公司对同行业竞争者的影响。库格勒（Kugler，2006）^①考察了FDI对东道国产业组织的影响，研究表明产业间溢出效应比产业内溢出效应更为明显。

（4）国内学者的相关分类。我国学者傅元海（2010）将FDI的溢出机制重新分为技术转移和扩散效应、竞争效应和联系效应三种^②。李平（2007）将FDI溢出机制分为直接学习效应、关联效应和R&D本地化效应^③。薛漫天和赵曙东（2008）认为示范效应、人员培训效应主要体现为产业内溢出效应，前后向关联效应则体现为产业间溢出效应。

本书研究服务业FDI溢出效应是指服务业FDI对东道国生产率溢出效应。溢出机制则借鉴凯夫斯（Caves，1974）以及傅元海（2010）的思想，将服务业FDI的示范效应以及人员流动效应归结于服务业FDI的“软技术”^④溢出效应。另外，就服务业而言，服务业FDI的产业内溢出效应是指服务业跨国公司对本土服务业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服务业FDI的产业间溢出效应则表示为服务业跨国公司对本土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由于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的中间投入，服务业FDI产业间溢出效应表现为前向关联效应，即服务业FDI对本土制造业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一、本书的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图

本书分为九章内容。其中第一章为引言，第二、第三章为文献综述，

^① Kugler M. Spillovers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ithin or between industries?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6, 80 (2): 444-477.

^② 傅元海、唐未兵、王展祥：《FDI溢出机制，技术进步路径与经济增长绩效》，载《经济研究》2010年第6期。

^③ 李平、崔喜君、刘建：《中国自主创新中研发资本投入产出绩效分析——兼论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④ 软技术包括“管理、组织、技术技能或营销知识”等。

第四章至第八章为文章的主体。具体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为引言。主要包括问题的提出、文章的结构安排、研究思路等。第二章为文献综述。第三章为服务业 FDI 的发展特征与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全球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特征、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特征以及服务业 FDI 发展的影响因素。

第四章进入全书的主体部分,本章对服务业 FDI 的溢出机制进行全面的研究。首先通过对弗朗索瓦(Francois, 1990)的模型进行改进,得出服务业 FDI 能够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并将服务业 FDI 的溢出机制划分为服务业 FDI 的研发外溢效应、服务业 FDI 的产业关联效应以及服务业 FDI 的集聚效应;第二,基于生产分割理论,构建了服务业 FDI 的研发外溢模型;第三,对鲍莫尔(Baumol, 1967)和佐佐木(Sasaki, 2012)的模型进行了拓展,构建了服务业 FDI 产业关联效应的模型;第四,基于阿密特(Amit, 2005)的模型,构建了服务业 FDI 集聚效应的相关理论模型。第五章为服务业 FDI 的溢出效应及其门槛特征。首先,用跨国面板数据从整体层面研究了服务业 FDI 的溢出效应是否存在。其次,将服务业 FDI 分为金融服务业 FDI 和非金融服务业 FDI,分别考察了不同类型服务业 FDI 溢出的异质性。最后,进一步对服务业 FDI 的溢出效应进行了门槛特征分析。第六章,服务业 FDI 的 R&D 溢出的实证检验。首先,根据利希滕贝格和德尔普(Lichtenberg and Pottelsberghe, 1996)的研究利用跨国面板数据考察了吸收能力视角下服务业 FDI 的国外 R&D 资本是否促进技术进步;其次,将样本分为 OECD 国家和非 OECD 国家,分别进行了实证检验。第七章,服务业 FDI 产业关联效应的实证检验。首先,考察了服务业 FDI 的产业间溢出效应;其次,考察了服务业 FDI 对制造业效率提升的门槛效应。第八章,服务业 FDI 的集聚效应。首先,计算了我国细分行业服务业集聚的 E-G 指数;其次,考察了服务业 FDI 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最后,验证服务业集聚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动态溢出效应。第九章,主要结论与启示。本书研究的技术路线图如图 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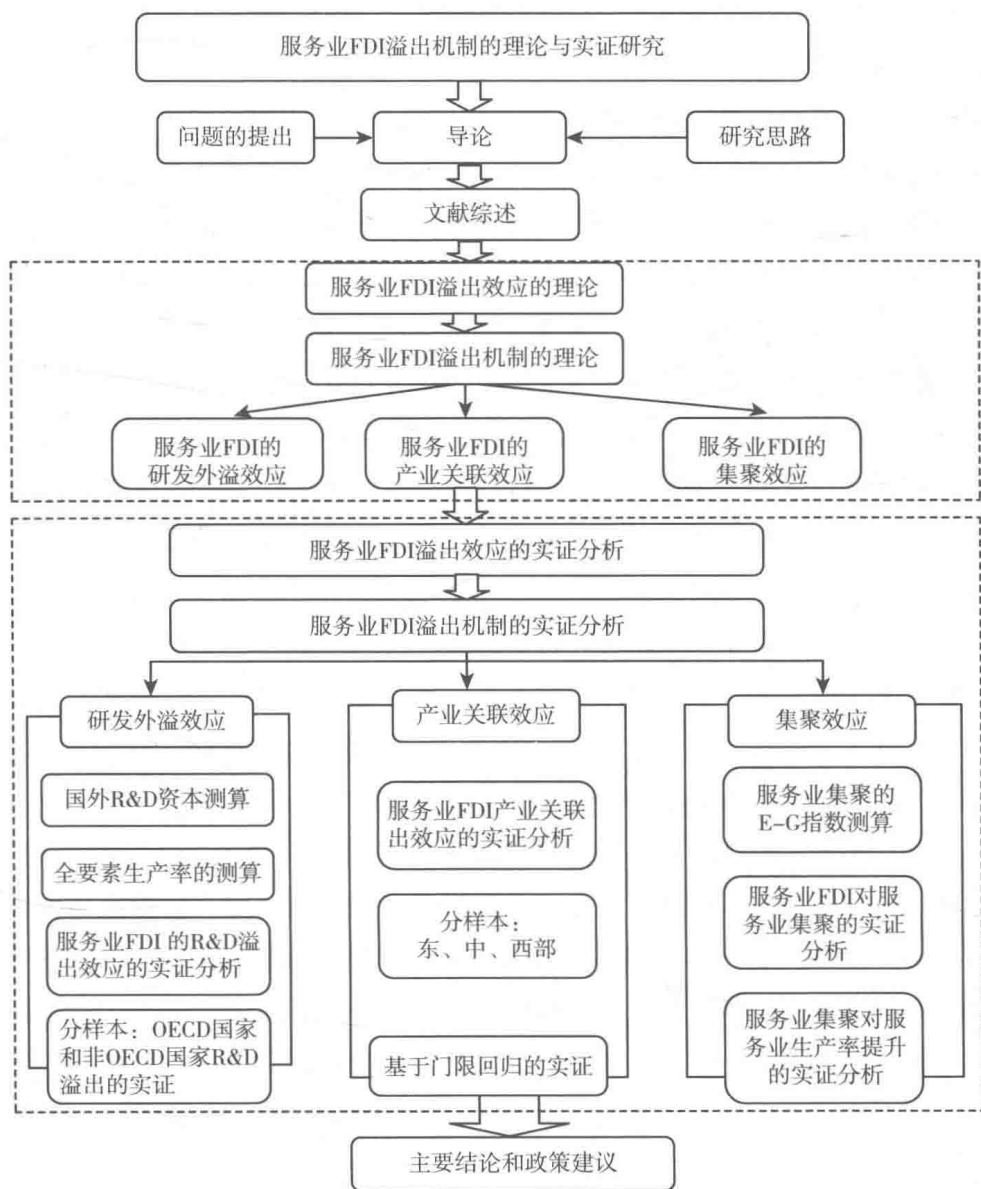


图 1.1 研究框架与思路

二、本书的基本内容

本研究主要从理论与实证双重维度分析服务业 FDI 的溢出机制。旨在为 FDI 结构转变的背景下实现我国服务业 FDI 的正向溢出效应、优化资